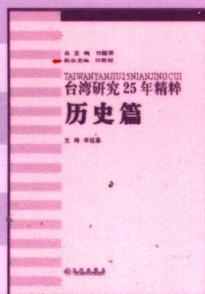


总 主 编 刘国深
副总主编 邓孔昭



TAIWANYANJIU25NIANJINGCUI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历史篇

主 编 李祖基

主 編 陳國棟
副主編 李筱峰



TAIWANESE AND CHINESE HISTORY
台灣研究 25 年精粹
歷史篇

主 編 陳國棟

臺北縣立圖書館

总主编/刘国深 副总主编/邓孔昭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历史篇】

主编 李祖基

九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历史篇/李祖基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80195 - 329 - 0

I. 台... II. 李... III. 台湾省 - 地方史 - 研究 -
文集 IV. K2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3962 号

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 · 历史篇

作 者 李祖基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0.75
字 数 1563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95 - 329 - 0/D · 135
定 价 125.00 元 (全 5 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25 年前的 7 月 9 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前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这是大陆方面提出“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的对台政策新主张后，海峡两岸第一家公开成立的台湾问题综合研究学术机构。从那时起，以专业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观察和研究台湾问题，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厦大台湾研究学者的神圣使命。

在过去的 25 年当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团队涌现出陈碧笙、朱天顺、陈在正、陈孔立、范希周、黄重添、翁成受、韩清海、李强、林长华、林仁川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没有这些曾经为厦大台湾研究呕心沥血的学者专家不懈的努力，就不会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今天的格局。在此，我们要特别纪念陈碧笙教授、朱天顺教授、范希周教授、黄重添教授等故去的学者，他们为厦大台湾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早已镌刻在海内外台湾研究界不朽的丰碑中。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最早可以溯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郑成功研究”。台湾研究所成立后，研究触角迅速扩展到台湾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各个领域，最近由陈孔立教授撰写的《台湾学导论》公开出版，标志着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开始朝严谨的学科体系建设方向发展。勿庸讳言，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与海内外许多成熟的研究机构一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因此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但在众多“溢美”之词中，我们始终对各种以“某某派”相称的戏谑之言敬谢不敏，因为厦大台湾研

究的特色远非这些简约的语汇所能准确描述。首先,厦大台湾研究团队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团队内部向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有谁要以“某某派”自称,在研究院内部就会立刻招致非议;其次,厦大台湾研究团队一直注意吸收海内外台湾研究学者不同的思想精华,厦大台湾研究学术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海内外同行的“知识加持”。个人认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为依托,注重基础研究,特别注意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还得益于多学科综合研究优势,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打造了厦大台湾研究最坚实的知识基础。

回首 25 年来时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发展成为台湾研究院,厦大的台湾研究从福建省重点学科晋级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进而又跻身“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些可喜的发展凝聚着所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和正在工作着的全体同仁的汗水和智慧。展望未来,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弘扬前辈先进“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精神,更要脚踏实地,常怀自省之心,在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前沿性研究。本辑五本论文集名为“精粹”,实为我院全体在岗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白书”,希望它有幸成为所有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爱之深,责之切”的学术同行们针砭批判的对象——任何善意的批评和指正都将成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继续成长的动力。

最后要感谢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

刘国深

2005 年 5 月 31 日

目 录

澎湖不属同安考	陈孔立 (1)
周婴《东番记》研究	李祖基 (9)
澎湖危机	
——贸易、战争与谈判 (1622—1624 年)	
.....	陈小冲 (35)
评荷兰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	林仁川 (101)
明郑台湾建置考	邓孔昭 (117)
论清代移民台湾之政策	
——兼评《中国移民史》之“台湾的移民垦殖”	
.....	李祖基 (134)
从闽台物缘看福建移民及其影响	张彩霞 (153)
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	
——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	周翔鹤 (163)
晚清闽台的商业贸易往来 (1860—1894)	林仁川 (176)
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	林仁川 (202)
日据时期 (1922 年以前) 台湾农家	
经济与“米糖相尅”问题	周翔鹤 (212)

1895—1937 年台湾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殖民

当局的同化政策

——读台湾乡土文献 周翔鹤 (228)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 周翔鹤 (245)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 陈小冲 (264)

光复前台湾农业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林仁川 (277)

台胞在大陆组织统一革命团体推动台湾

光复运动 陈在正 (294)

李友邦有关历史问题探讨 陈在正 (329)

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 邓孔昭 (356)

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

——兼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 李祖基 (373)

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

与地方自治要求 邓孔昭 (393)

澎湖不属同安考

陈孔立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说法：“澎湖在历史上曾经属于同安县管辖”。有关这种说法，可以举出一些史料作为依据，至于这些依据是否可靠，则需要经过一番考订，才能得出结论。早在 25 年前，我就写了《元置澎湖巡检司考》^①，说明元代澎湖属于晋江县。本文的重点则是探讨明代澎湖是否属于同安县。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还需要从元代讲起。

元代澎湖属于晋江县

至今仍有不少著作提出，元代所设澎湖巡检司属于同安县。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林谦光：《台湾纪略》指出：“澎湖旧属同安县”。

二、乾隆三十五年（1770）胡建伟：《澎湖纪略》指出：“迨元末时，（澎湖）始置巡检司以官斯地，隶属泉州郡同安县治”。

实际上，更晚的光绪十九年（1893）林豪《澎湖厅志》也说：元时澎湖巡检司“隶同安县兼辖”。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书（包括新编的《同安县志》）沿用了这个说法。但是，上述三条史料是不可靠的。理由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史料说明“属同安县”，而全部说是“属晋江县”。

^① 孔立：《元置澎湖巡检司考》，《中化文史论丛》1980 年第 2 期。又见陈孔立著：《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台海出版社，1999 年。

请看：

早在南宋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写的《诸番志》就指出：“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闽书》卷七引用“宋志”说：“澎湖屿在巨浸中，……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这也是宋代的记载。^①

元代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指出：澎湖“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

明代黄仲昭编撰的《八闽通志》在卷七晋江县条目之下，记载了澎湖。

明代后期陈懋仁写的《泉南杂志》也重复了澎湖“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的说法。

这说明在林谦光之前，没有人说过澎湖属于同安。林谦光的说法是没有史料依据的。后来胡建伟进一步发展了上述错误，他把元代澎湖巡检司说成属于同安。可见，“属同安说”的错误是设巡检司后大约 400 年后才形成的。

明代澎湖不属同安县

有人主张明代澎湖属于同安县，也有一些史料依据：

一、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湾府志》写道：“明嘉靖间，澎湖属泉同安，设巡检守之。旋以海天遥阻，弃之”。

二、康熙四十九年（1710）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沿袭了上述说法。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说明代澎湖属于同安，相反的，一些可靠的史料却证明澎湖仍然属于晋江。请看：

一、上文已经提出《八闽通志》《泉南杂志》等明代著作都

^① 据学者考证，“宋志”即范子长《皇朝郡县志》，参阅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第 103 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说澎湖属于晋江。

二、明万历年间担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在《议处海坛疏》中明确指出：“澎湖属晋江地面”。作为当年的“省长”，他对自己管辖范围的说法应当是具有权威性的。

三、明万历年间何乔远：《闽书》在晋江县条目下写了澎湖屿，引用《宋志》：“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并在“澎湖游”下指出“晋江海外绝岛也”。

四、乾隆五年（1740）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写道：澎湖“明隶泉州府晋江县”。

明代澎湖作为一个被当局把居民全部迁出而“墟其地”的海岛，显然没有必要特地为之更改其隶属关系。通过资料排比，可以发现“明代澎湖属同安说”是由于高拱乾的错误引起的，后来撰写台湾府志的人（如范咸、余文仪等）就没有再重复这种说法了。

关于“澎湖游兵”

主张明代澎湖属于同安的，估计还受到“澎湖游兵”的影响。

道光十九年（1839）周凯：《厦门志》在“兵制略”中指出：“万历二十年，移南路参将驻鹭门，居中调度，辖铜山、浯屿二寨，浯铜、澎湖二游”。乾隆二十八年（1763）《泉州府志》、光绪四年（1878）《漳州府志》都有类似记载。此外，《厦门志》“职官表”“武秩”有：“南路参将，万历二十年自漳州移驻”，“澎湖游击，万历二十五年增设，属南路参将，驻厦门，而澎湖其遥领也”。

“澎湖游兵”与澎湖的隶属有什么关系呢？现将相关原始资料介绍如下：

一、王家彦：《闽省海防议》写道：“万历二十四年抚臣金学圣委分守张鼎思、都司邓钟躬阅汛地，复请添设嵵山、海坛、浯

州、浯铜、悬钟、礮山、台山、澎湖诸游于一寨之中，以一游翼之”。《明实录》万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金学圣奏：“唯澎湖去泉州程仅一日，绵亘延袤，恐为倭据，议以南路游击汛期往守”。这个建议得到“部覆，允行”。但是，局势稍为平静之后，“会哨之法遂杳然矣”。

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提到“澎湖游兵”：万历“二十五年冬，初创一游、一总、四哨，冬鸟船二十艘，目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春，又虑孤岛寡援，增设一游总哨”。“今仅有一总二哨，冬鸟船二十艘，官兵八百五十有奇，月糈则漳泉共饷之”。

三、明代后期福建巡抚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指出：万历二十年“当事者始建议戍之。镇以二游，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余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他还说官兵视戍守澎湖为畏途，经常寻找借口“偷泊别澳”，实际上是“有守之名，无守之实”，因而建议：“今合以澎湖并隶浯彭游，请设钦依把总一员，专一面而兼统焉”。

四、沈鈇：《上南巡抚暨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建议：专设游击一员，镇守湖内；招募精兵二千余名，环守湖外。

这些资料表明，当年为了防倭，在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才考虑在澎湖设置“游兵”，但没有接纳派兵驻守的建议，而是采取“会哨”巡查的方式，军粮还要漳泉两地分摊，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作用很小。

这里还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南路参将。据《福建通志》“兵制”载：明代分福建地方为三路，以福宁为北路、兴化为中路、漳州为南路。又“职官”载：“南路参将，嘉靖间置，驻漳州”。澎湖游兵属南路参将。二、“澎湖游击，万历二十五年增设”，这是1996年版《厦门志》职官表的记载。我怀疑“澎湖游击”应是“澎湖游兵”之误，因为“澎湖游击”是天启五年（1625）才设立的，《明实录》记载，当年六月，命铸“澎湖新设

游击关防”。《明史》兵志也说：“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

总之，上述资料已经表明，“澎湖游兵”只涉及兵制，而不涉及行政隶属关系。《厦门志》编者周凯还是把握原则的，他把“澎湖游兵”列入“兵制”和“武秩”，而不列入“建置”和“职官”（文职）之中。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因为澎湖游兵属南路参将，明代澎湖就要改属于同安县。

明代澎湖是否设巡检司

上面引述高拱乾《台湾府志》：“明嘉靖间，澎湖属泉州同安，设巡检守之。旋以海天遥阻，弃之”。后来，乾隆七年（1742）刘良璧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写得更加具体：“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扰乱边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台。大猷……留偏师驻澎……道乾既遁，澎之驻师亦罢，因设巡检守之，既以海天遥阻，裁弃”。这是有关明代澎湖设巡检司的主要依据。后来由于连横《台湾通史》也沿用这个说法，因此流传甚广。

这些史料说明：第一，巡检司的设立与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追击林道乾有关；第二，巡检司设置不久就废除了，此后就没有再设。

先看俞大猷的史料。除了一些台湾方志以外，有关原始资料及俞大猷传记资料，都没有俞大猷追击林道乾到澎湖的记载。《明实录》嘉靖四十二年（1563）有关俞大猷的记载有：正月，漳州月港设守备，听总兵俞大猷节制；四月，新倭自长乐登岸，俞大猷等合兵击退；又击犯兴化倭于平海卫，平之；五月，因俞大猷赴援不及，“戴罪自效”；七月，因四月平海大捷，俞大猷获赏银二十两；十月，福建巡抚谭纶奏：“总兵官俞大猷宜复还伸威营”。这说明嘉靖四十二年没有俞大猷与林道乾作战的记载，

可能是由于当时林道乾只是吴平集团中的一股势力，尚未单独成为官兵的对手，所以，《明实录》中还没有出现林道乾的名字。

现在查到一条有关史料是《南澳县志》的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林道乾与曾一本结为声援，犯诏安。“总兵俞大猷逐之，遁入北港。大兵不敢进，只留偏师驻守澎湖”，道乾南奔占城。^①这与台湾一些方志的记载相当接近，只是时间相差了3年。此外，《明史》列传，“吕宋”也有类似的记载：“万历四年（1576），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国（吕宋）”，不过，时间比嘉靖四十二年晚了13年。这说明林道乾究竟是哪一年被官兵追击到台湾，是有不同说法的。此外，《明史》鸡笼山条记载：“嘉靖末，倭寇扰闽，大将戚继光败之，倭遁于此，其党林道乾从之”，而没有提到俞大猷。

再看林道乾的资料。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俞大猷与戚继光夹击海贼吴平于南澳。四十五年吴平败，林道乾是吴平的“余党”。早在70多年前，前辈学者就对林道乾事迹做过考证，张星烺写了《林道乾事迹考》，黎光明做了补正。黎先生认为有关林道乾的事迹“遍览各书所载，无早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者”，那就是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讨吴平、林道乾于诏安，灭之”，因为“二林（指林道乾、林凤）虽皆吴平之余党，而在吴平未死之前，固尚属跳梁之小丑”^②。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开始，《明实录》才有林道乾的资料：“时吴平既败，余党陈新老、林道乾等后窥南澳”。隆庆三年（1569）提到“抚贼林道乾叛服不常”，“林道乾最号黠狡”，又说“抚民

① 陈光烈撰、许伟斋主编《南澳县志》卷十四，民国三十四年缩印本。转引自王琳乾等辑编点校：《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第149页，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一辑，2000年。

② 张星烺：《菲律宾史上‘李马奔’之真人考》，附《林道乾事迹考》，《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黎光明的“补正”，见《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黎先生未见到台湾的一些方志。

林道乾等实用命，宜许赎罪”；六年提到，林道乾名为“招安”，至今无可奈何；万历元年（1573）林道乾“叛招出海”投奔外国；到了万历六年，提及林道乾曾经打暹罗国船不胜，要打劫海门各所；八年，林道乾“以大泥、暹罗为之窟穴”。这说明在嘉靖四十五年以后，没有林道乾到澎湖的有关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巡抚涂泽民在嘉靖四十五年以后写的《行广东抚镇》指出：“其实道乾自聚党下海，实未尝惊动闽中一草一木，闽中实不忍无故加之以兵，以阻其向善之念”。似乎福建官民对林道乾还有好感。

此外，在台湾的方志中有关林道乾还有一些传说，包括其妹埋在金山、林道乾掠杀土番等等，早已有人提出质疑。林道乾究竟是广东惠来人、澄海人，还是福建泉州人？是1563年到台湾，还是1566年？是从北港上岸，还是从打狗山、苏澳上岸？退出台湾后，是到大泥（北大年），还是到占城、昆仑或吕宋？说法都不一样。

罗列这些资料是为了说明：“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征林道乾于澎湖”的说法有不少矛盾，是令人怀疑的。如果无法证实，那么由此而引发的设巡检司，也就成问题了。台湾学者曹永和在《早期台湾的开发与经营》一文中指出，没有林道乾“逃至台湾的确实记载”。可能有鉴于此，在他的论文和许雪姬专门研究明代澎湖的论文中^①，都不提设巡检司的事，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明实录》却有林凤的相关记载：万历二年十月，福建海贼林凤自澎湖逃往东番魍港，总兵胡守仁等追击之。四年九月，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这说明与林道乾相比，有关林凤到达澎湖、台湾的说法则是有原始资料作为依据的。

^① 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139-140页，联经出版，1981年。许雪姬：《明代对澎湖的经略》，《台北文献》直字第46期，1978年。

最后，还要澄清一种说法：“澎湖巡检司兼辖台湾地区”。实际上，巡检司是一个最小的官，职权十分有限。《元史》“百官七”载：“巡检司，秩九品，巡检一员”。《明史》“职官志”指出：“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让晋江县里最小的官，管澎湖三十六岛，已经够吃力的了，要他管整个台湾，怎能担当得起。

总之，本文的结论是：一、历史上的澎湖曾经属于晋江县，从未属于同安县。二、明代澎湖设巡检司一事，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应当存疑。

周婴《东番记》研究

李祖基

一、引言

明末莆田周婴撰写的《东番记》是台湾早期历史，特别是台湾原住民历史的最重要文献之一，收在氏著诗文集《远游编》之中，清前期私人的笔记文集及台湾地方的志书中曾屡有提及，然而，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番记》竟遭湮没，很少人见到，以至于后人的著述提到其作者时，或张冠李戴；或认为《远游篇》中所载之《东番记》为连江人陈第所撰。本文试从古籍中有关周婴《东番记》的记载、今人对周婴《东番记》的研究、两种《东番记》的比较、周婴《东番记》部分内容之分析及周婴《东番记》的资料来源等几个方面对周著《东番记》作一探讨，谬误和欠妥之处，希望学者、先进不吝批评、指正。

二、古籍中有关周婴《东番记》的记载

据目前所见，古籍中最早提到周婴《东番记》的为《台湾随笔》。该书作

者徐怀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福建漳州的石码登舟，经厦门、金门渡海赴台，在台岛居留一载始回内地。徐氏在《台湾随笔》中记道：“台湾，于古无考。惟明季莆田周婴著《远游篇》载《东番记》一篇，称台湾为‘台员’，盖闽音也。然以为